



## 吴波、樊依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现状、使命与矛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未来社会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是全面性的，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关系的质的转变，也包括思想观念体系的质的转变。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表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价值观念多元差异并存，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严重弱化，我国社会意识领域出现的这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在强调文化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的同时，突出以文化的反作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意义，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 一、文化与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

文化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唯物史观认为，它与经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特性。每个时代的人们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文化观念的。[1]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2]他还特别强调：“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是全面性的，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关系的质的转变——诚然，这是最为关键的转变，这一替代的过程理所当然地包括思想观念体系的质的转变。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这一重要命题时，思想观念的解放作为与“消灭私有制”同样重大的历史任务同样地赋予了无产阶级。倍倍尔就曾急迫地表达了这一愿望：“目睹资本主义条件下种种丑恶现象，目睹宗教唯灵论和金钱拜物教对群众的腐蚀，我们痛心疾首。我们多么渴望有朝一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逐步地、全面地、系统地实现我们的思想道德信念和核心价值，”[4]当然，这种替代并不能消除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这两个一般特性。不同民族往往有着不同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多样性密不可分。人们所继承的全部历史的基础，不仅包括生产力的因素，也包括文化的因素。因此，任何文化的变迁都不是重新创造一切，而是改造，人总是从已有的思想资料中寻找构建与新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的元素，这就决定了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摆脱不了传统。[5]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给予文化一种很高的价值。”[6]这一点不仅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观点中得到充分的验证，也可以从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中获得可靠的论据。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的首要任务，自然在于提高生产力的总量，为社会主义构筑物质基础，但是，倘若以此忽视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过于片面而幼稚。列宁深刻认识到，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文化教育工作和发展生产力的同等重要性。对于“文化革命”[7]的意义，列宁明确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主要就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则“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在他看来，实现了文化革命，俄国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社会主义文化自然不是在空地中产生的，它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自身与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关系问题。诚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

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8] “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 [9] 列宁不仅从整体性的视角认识到文化建设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价值。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列宁明确地提醒道：“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有就不错了。” [10]

在对文化的特性和文化建设之于社会主义意义的认识上，毛泽东表现出与马克思和列宁高度的一致性。在他看来，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毛泽东指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传封建主义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也没法建立起来。” [11] 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中，自然“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12] 他认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13] 这些重要论述，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忠实继承和准确阐发。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提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14] 由此也拉开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序幕。概括而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方面，毛泽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在他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要学习外国的文化艺术，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创造出“有社会主义的内容”、“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中国自己的”思想文化。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基本思路，也第一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总体性设计。二是指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他看来：“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15] 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成效，单从社会风气的变化就可感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怀抱崇高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捍卫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处处表现良好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 [16] 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也反映出毛泽东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极端性理解，致使包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意识领域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生产力的获得举世瞩目的持续而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均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标识出这场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社会意识领域出现的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1、价值观多元差异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在推动利益共同体的解体进程的同时，也触发了价值观共同体的解体进程。价值观作为人们的文化积淀和生活实践的产物，是人们的利益、需要等在心理、思想和行为取向上的反映，具有鲜明的主体性。 [17] 换言之，任何价值观都只能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物质利益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不仅造就了多元的价值观主体，也催生和促成了当代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和多元态势，创造出价值观多元化的生存空间。20世纪80年代，既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年代，也是一个各种价值观生成并跃动的年代。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精神洗礼，社会意识领域价值观多元化现象业已成为一种经验性的事实。



多元导致差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差异性不仅反映在经济利益的层面,也反映在价值观念的层面。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分层时发现,各个阶级阶层的人的思想观念都会在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变动中发生变化和分化。比如,在拥护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的方向发生根本质疑这个基本问题的分歧上,人们已经划分成不同的群体意识、不同的社会态度、不同的思潮派别和不同的行动取向。这种分野所涉及的社会阶层认同,常常因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焦点问题而发生重组。[18]当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社会意识领域价值观的差异性,也就由此获得了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现实合理性。并且,经过多次分化和重组,多元的价值观主体已经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就此而言,改革的某些举措从最初的主动性普遍认同到主动性部分认同的重大变化,并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正如有论者所认为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将会成为一种常规性的社会现象” [19]。

价值观多元化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价值观的多元化有利于推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的解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思想解放大潮的激烈涌荡,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推进,这是积极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价值观的多元化也导致社会主义价值观边缘化和全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及失序。对于多元价值观现实性的承认,并非意味着对每一种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承认。“在这种变化中,主要是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思想观念的解放,但也潜藏着价值观念和道德滑坡的危机以及某些社会问题。” [20]基于社会主义价值立场,不能不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边缘化的状况正在强化。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稳定化趋势所决定,各个社会阶级阶层的不同价值取向进一步稳固化和显性化,价值观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强化。如果说价值观多元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地体现为积极意义的话,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物质主义的强势地位进一步凸显,价值观多元化的消极性影响正在逐步强化。随着价值矛盾的日益普遍化,价值观的多元差异并存开始有向多元对立冲突的方向转化的趋势。

2、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兴起,都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文化根基,并脱离不了一定的国际国内社会条件。革命或改革的年代,往往是社会思潮生成和活跃的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陆续登上中国社会舞台的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作为改革开放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人们思想观念深处的反映,是社会意识领域深刻变化的真实写照。这些相互激荡的社会思潮,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变迁的历史进程,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丰富复杂的历史轨迹,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意识领域的特殊景观。

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究竟有哪些主要社会思潮,在不同学者的视野中有认识上的差别。有的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真正能在中国社会形成广泛影响、构成社会思潮的思想意识并不很多,其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最具影响,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三大社会思潮。[21]有的学者则从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对立性质的角度,认为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政治思想领域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价值领域的“普世价值”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社会思潮。[22]还有的学者从解构启蒙的角度,认为当代中国有国家主义、古典主义和多元现代性等三种主要思潮。[23]其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政治儒学思潮,是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几种主要社会思潮。

3、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严重弱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和巩固,社会意识领域出现了从计划经济时期意识形态的过度强化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淡化趋势的转变,社会实际生活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映出去意识形态化的特征。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对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认同不断提升的趋势。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2月1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用中国问题专家劳伦斯·布拉姆的话说:“中国已从意识形态主宰一切、不存在任何物质主义的状态,转变为物质至上、不讲人格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状态。人们有所期望成为了普遍现象。现在大家谈论的是‘用什么品牌’。”

就其实质而言,意识形态淡化的过程,伴随着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消解的过程。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仅仅用了30多年时间,我国社会就基本完成了从想旗帜高扬到物质主义盛行的重大转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2010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培育的以破私立公、为人民服务为特征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引以为自豪的精神优势。现在时过境迁,这两个传统究竟还有多大分量?”“在这些

方面，优良传统的影响依稀可见，同时也存在严重的不良倾向。各种信息提示我们，信仰不明，道德沦落，文化低俗的气氛正在弥漫，对中华民族的复兴造成严重的困扰。” [24]许多人在追逐充裕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渐渐淡忘了关于人生理想信仰的话题，“一切向钱看”成为了多数人内心深处的最高追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 [25]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改革开放初期积极的参与和高涨的热情蜕变为对于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漠不关心，呈现出所谓“精神疲劳”的现象，集体回归到个体的现实生活之中。一系列“恶搞”的文化现象的背后，无疑是理想的放逐和精神家园的荒芜，当大学教育的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时，工具理性的大行其道就显得不足为怪了。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理想信仰的弱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既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那么，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重大调整 and 对外开放，就成为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的现实选择。这一现实选择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是，社会民众在基本生存方式上出现了高度的市民社会化的特征，虽然就其性质而言，这一特征不同于马克思所言的市民社会。其核心表现是，随着财富的发展，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都产生了走向弱化的趋势。[26]

总体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意识领域出现的这三大特征，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反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观念领域的实然状态。对于社会意识领域的这些变化，既要看到其积极性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其消极性的一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这种变化中，主要是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思想观念的解放，但也潜藏着价值观念和道德滑坡的危机以及某些社会问题。” [27]我国精神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消极现象是一种代价，但不是无足轻重的代价。” [27]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社会意识领域变化的消极性一面，需要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然状态，努力按照目标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逐渐克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意识领域应然和实然之间的矛盾。

###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双重使命与三大矛盾

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一重使命，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性要求。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时，邓小平并没有因此忽视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1980年12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28]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 [2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性的强调，其首要意义在于避免这样的可能性，即由于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导致对文化建设的忽视。不容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为例：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特征十分明显，并且，文化发展的地域不平衡现象严重。广东近七成的文化经济总量、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进出口、文化投资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山区和东西两翼地区的文化设施建设总体上远远滞后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由此导致了“一个不相称、两个不相适应”，即广东的文化事业与广东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称，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广东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30]

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以文化的反作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另一重使命，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要求。对于这一特殊使命，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处就已经有十分明确的认识。之所以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了重要位置，说明我们党充分认识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文化建设的特殊意义：“一般地说，物质文明建设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殊地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客观环境，更迫切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3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意识领域出现的社会主义价值相背离的变化，具有现实必然性。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必然会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

式等消极现象，对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冲击，也会侵蚀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队伍，甚至毁掉一些意志薄弱者。”

[32] 社会意识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决定了文化反作用的意义更为突出。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具有了服务和匡正的双重功能。匡正和批判具有一致性，匡正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匡正，体现出一种建构的立场。

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意识领域的客观实际，决定了社会主义匡正的现实性，这是保证在获得资本主义肯定性文明成果的同时，推动社会主要制度的巩固和完善的根本途径。概括而言，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所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将长期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矛盾。对于这三个方面矛盾的克服和解决，构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任务。

1、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文化的民族特性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和建构起来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继承性，社会主义文化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前提性任务。毛泽东说过：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为自己的东西。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应持辩证分析的态度。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承担着一个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性文明成果的历史任务，其中当然包括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肯定性文明成果。在对待这两种文化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应重点把握好扬弃的原则。无论对于传统文化还是对于西方文化，吸收都不是不加甄别地照单全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始终蕴涵着一个吸收和批判双重关系的问题。

2、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意识形态属性还是商品属性，都是文化产品的客观属性。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但中国社会的实质性变革是在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这一变革启动的标志。由此带来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是：文化部门在生存方式方面和社会功能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生存方式方面，文化部门开始从消费性行业向生产性行业的转化。这种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的生产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生产的产品不是物质，而是文化。这种精神产品对人们的物质需求、政治需求和精神需求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社会功能方面，文化部门要从党和政府的思想、政策宣传的单一功能向宣传和商品的双重功能的转化。后者的强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性的相对弱化。应该看到，当前消费文化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遮蔽或替代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立意。如何正确把握好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是这一特殊阶段一项艰巨而复杂的课题。

3、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到今天，社会意识领域的矛盾已经是经验性事实。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仍然在社会意识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正在努力转化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诸如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社会现象，也在时时提醒我们：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始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据《人民论坛》2010年3月出版了“未来10年10大挑战”的特别策划，经过对8128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被选出，成为我国未来十年的十大挑战之一。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防守性可能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性特征，这就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主动性引领的努力，必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96页。

[3][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648页。

[4] 韦建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内涵、科学精神、创新品格》，《光明日报》，2007年12月4日。



- [5]陈先达：《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 [6]（英）雷蒙德·威廉斯著：《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 [7][8][1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285、784页。
- [9]《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
-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 [14][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31页。
-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 [17]李景源、孙伟平：《价值观和价值导向论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 [18]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 [19]孙立平：《构建以权利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南方周末》，2004年1月1日。
- [20][27]陈先达：《论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
- [21]房宁著：《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页。
- [22]本刊记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马克思主义的几种主要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
- [23]许纪霖：《矛盾体——〈另一种理想主义〉自序》，《东吴学术》，2010年第1期。
- [24]陈奎元：《抓住时代机遇，复兴中华文明，开创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0日。
-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页。
-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页。
- [30]赵剑英、吴波：《建设文化大省促进广东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8期。
- [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519页。

[32]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网络编辑：客卿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2-12-17 10:06:27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E-mail: myyw1bjs@163.com 京ICP备05072735号